

李敖主編

遠流出版公司

中國名著精華全集

《第二冊》

中國名著精華全集

李敖 主編

遠流出版公司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國名著精華全集·序

李敖

談中國名著，得先談中國書，談中國書，得先談中國的文字歷史。

中國歷史從地下挖出的「北京人」起算，已遠在五十萬年以前；從地下挖出的「山頂洞人」起算，已遠在兩萬五千年以前；從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，已遠在四千五百年以前；從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，已遠在三千五百年以前。這時候，已經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龍，史實開始明確；從紀元前八四一年（周朝共和元年）起，中國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來的記錄；從紀元前七二二年（周平王四十九年）起，中國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來的記錄。中國人有排排坐的文字歷史，已長達兩千八百多年。

從何處說起

在長達兩千一百多年的時候，一位殉道者文天祥，被帶到孤殉道者的元朝博羅丞相面前，他告訴博羅：「自古有興有廢，帝王將相，挨殺的多了，請你早點殺我算了。」博羅說：「你說有興有廢，請問從盤古開天闢地到今天，有幾帝幾王？我弄不清楚，你給我說說看。」文天祥說：「一部十七史，從何處說起？」

三百多年過去了，十七史變成了二十一史，一位不同黑暗統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黃宗羲，回憶說：「我十九、二十歲的時候看二十一史，每天清早看一本，看了兩年。可是我根

笨，常常一篇還沒看完，已經搞不清那些人名了。」一部二十一史，從何處說起？

三百多年又過去了，二十一史變成了二十五史。書更多了，人更忙了，歷史更長了。一部二十五史，從何處說起？

何況，中國歷史又不只二十五史。二十五史只是史部書中的正史。正史以外，還有其他十四類歷史書。最有名的「資治通鑑」，就是一個例子。司馬光寫「資治通鑑」，參考正史以外，參考了三百二十二種其他的歷史書，寫成兩百九十四卷，前後花了十九年。大功告成以後，他回憶，只有他一個朋友王勝之看了一遍，別的人看了一頁，就愛睏了。

一部中國史，從何處說起？

古書有多少呢？

何況，中國書又不只歷史書，歷史書只是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中的一部分，清朝的史學家主張「六經皆史」，這下子經書又變成了歷史書。其實凡書皆史才對，中國人面對的，已不是歷史書的問題，而是古書的問題。

古書有多少呢？

古書多得嚇人。

古書不只什麼「古文觀止」、「唐詩三百首」，它們只不過佔兩種；古書不只什麼「四書」、「五經」，它們只不過佔九種；古書不只什麼二十五史，它們只不過佔二十五種。古書遠超過這些，超過十倍一百倍一千倍，也超過兩千倍，而是三千倍，古書有——十萬種！嚇人吧？

這還是客氣的。本來有二十五萬三千種呢！幸虧歷代戰亂，把五分之三的古書給弄丟了，只剩下十萬種了，不然的話，更給中國人好看！

又何況，還不止於古書呢！還有古物和古蹟，有書本以外的大量殘碑斷簡、大量手澤宗卷、大量玉器石鼓、大量故壘孤墳，和陸續不斷的大量考古出土。……要面對起來，更難上加難了。

又何況，一個人想一輩子獻身從事這種「白首窮經」的工作，也不見得有好成績。多少學究花一輩子時間去在古書裏打滾，寫出來的，不過是「斷爛朝報」；了解的，不過是「瞎子摸象」。古書太難了解了。

你不配做中國人

於是，中國人的辦法便是：口口聲聲說復興中華文化，但事實上，他們卻對古書敬而遠之，思念起來，未免慚愧。

說你不配做中國人，你一定從心裏不服氣；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國人的條件，你一定從心裏慚愧。

做中國人，總不能不看中國書吧？你看了多少中國書呢？「四書」、「古文觀止」、「唐詩三百首」，一數之下，不過幾種而已，這就叫慚愧。

面對十萬種的古書，面對這一龐大遺產，中國的子孫們到底該怎麼辦？不看嗎？說不看去；看嗎？從何看起？又多麼難看？這的確是一個令人痛苦的問題。

爲了解決這個令人痛苦的問題，有心人便出來，想法子做種種選本，來餵中國人。可歎

的是，這些選本都失敗了。失敗的原因，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「文章」為檢定標準了，太注重「文章」掛帥，並且這種「文章」，又太局限在僵化的模式裏頭了。

好壞標準

以中國「文章」的大家而論，中國人評判「文章」，缺乏一種像樣的標準。行家論「唐宋八大家」，說韓愈文章「如崇山大海」、柳宗元文章「如幽巖怪壑」、歐陽修文章「如秋山平遠」、蘇軾文章「如長江大河」、王安石文章「如斷岸千尺」、曾鞏文章「如波澤春漲」，……說得玄之又玄，除了使我們知道水到處流、山一大堆以外，實在摸不清文章好在「那裏」？好的標準是什麼？

又如林紓說他的文章是「史（記）漢（書）之遺」；章炳麟卻大罵林紓吹牛，說林紓的文章，乃從唐人傳奇剽竊衍演而來。章炳麟又說「當世之文，惟王闓運為能盡雅，馬通伯為能盡俗」。其實一切攤開，有何史漢傳奇雅俗之分？文章只有好壞問題，並無史漢傳奇雅俗問題。文章的好壞標準，根本不在這裏。

做為新時代的中國人，我們評判文章，實在該用一種新的標準，我們必須放棄什麼山水標準、什麼雅俗標準、什麼氣骨標準、什麼文白標準。我們看文章，要問的只是兩個問題：一、要表達什麼？二、表達的好不好？有了這種新的標準，一切錯打的筆墨官司，都可以去它的蛋；一切不敢說它不好的所謂名家之作，都可以叫它狗屁。

從對對子到古文

古往今來，中國的「文章」特多，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，就在沒能將這二合一的問題擺平。中國人一談寫文章排名，韓愈就是老大，他是「唐宋八大家」的頭牌，又是「文起八代（魏晉六朝）之衰」的大將，承前啓後，代表性特強，可是你去讀讀他的全集看，你會發現讀不下去。你用上面兩個問題一套：一、他要表達什麼？答案是：他思路不清，頭腦很混，他主張「非聖人之志，不敢存」，但什麼是聖人之志？他自己也不知道；二、他表達的好不好？答案是：他好用古文奇字，做氣勢奔放狀，文言文在他手下，變成了抽象名詞排列組合，用一大堆廢話，來說三句話就可說清楚的小意思，表達得實在不好。

雖然這樣，韓愈卻還算是進步份子呢！中國文章自魏晉以後，就有話不好好說，一定要配成了對兒才說話，一作起文來，就是「四六體」。「四六體」是四句六句對偶而成的駢體文，是純粹的中國字一字一形一音一義的大排隊。中國人這時候，一寫文章就要對對子，寫滿篇文章就是寫滿篇春聯，滿篇堆砌、矯揉造作，非常討厭。到了唐朝，韓愈出來，主張秦漢古文，「師其意而不師其詞」、「唯陳言之務去」，雖然韓愈文章也一樣討厭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來，總是一種進步。

從古文到解放

這種進步，轉變到北宋的「古文」。「古文」一方面說復古，一方面也創新，雖然南宋以後，有「語體」出現，把白話和文言合流，但以「文章」正宗論，還是「古文」的天下。於是，從韓愈到曾國藩，中國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，「古文」就是我們一般指的文言文。

文言文的大缺點是它不能做爲好的表達的工具，它跟白話分裂，寫出來，是活人說死話，說得再好也是「古文辭類纂」。到了十九、二十世紀，有人開始突破，最成功的是梁啟超，梁啟超說他文章「解放，務爲平易暢達，時雜以俚語、韻語，及外國語法；縱筆所至不檢束。……老輩則痛恨，詆爲野狐。」

梁啟超雖被老輩痛恨，詆爲野狐，但他在中國文章史上，和司馬遷、韓愈等一樣，是十足劃時代的人物。梁啟超風靡文壇二三十年，最後由白話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，中國古書的時代，就告一段落了。

我們現在談古書，就是以這一段落做標準的。這一段落以前的書，就是古書。讀它們，無從讀起，不讀它們，又愧爲中國人。我們遭遇了「兩難式」。

分類的荒唐

對古書做選本，失敗在「文章」掛帥以外，另外的失敗，是「分類」籠統。

中國古書的分類，最流行的，是四部（經、史、子、集）分類。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，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。但是稍一留心，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。以四部中第一部「經部」爲例，「經部」的一部分，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，應分入總類、文學類、歷史類，其他部分（像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），應分入「集部」（個人集子）；以第二部分「史部」爲例，體裁上分正史、編年、別史、雜史、載記等，全無道理與必要，其他詔令應入法律類，時令應分入天文類，目錄應分入總類；以第三部分「子部」爲例，老莊申韓等家，其實與「論語」、「孟子」無別，都應分入「集部」，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、動

物類，類書應分入總類，小說應分入文學類；以第四部分「集部」為例，「經部」、「子部」分過來的書，多可分入哲學類、法律類、文學類。……總之，四部分類，大體上說，「經」「子」「集」多是一類，「史」是另一類，四部分類實在只是兩部分類。分類、分類、分了半天類，最後只分了兩類，所謂分類，分了等於沒分，這叫什麼分類！（並且若按前面所提「六經皆史」之說，甚至連兩類都沒有呢！）

雖然這樣，四部分類卻還算是進步的分類呢！其他像「永樂大典」以韻來分類；「文淵閣書目」以「千字文」來分類；朱彝尊「竹垞行笈書目」以「心事數莖白髮，生涯一片青山，空林有雪相待，古道無人獨還」七絕一首來分類，其荒唐程度，比四部分類就尤有過之了。

所謂書目指導

從分類的籠統中，我們可以看到，它的毛病發生在古書內容上面，發生在古書內容的籠統。因為中國思想獨尊儒家，思想失之一元化，所以常常古書一翻開，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。乍看起來，經常一部書中，什麼都包括；但細看之下，所包括的，又極有限，在儒家框框裏的同類作品太多太多，而異類的有個性有創見的作品太少太少，在這種情形下，要去做分類，尤其有現代眼光的分類，就非常困難了。

正因為古書衆多而又分類困難，所以有心人就開始想法子，使中國人能夠知所選擇。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舉書目，例如：

一、龍啓瑞「經籍舉要」，列舉書籍二百八十九種。

二、張之洞「書目答問」，列舉書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種。

- 三、胡適「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」，列舉書籍一百八十五種。
- 四、梁啟超「國學入門書要目」，列舉書籍一百六十種。
- 五、李笠「國學用書撰要」，列舉書籍三百七十八種。
- 六、陳鐘凡「治國學書目」，列舉書籍四百八十八種。
- 七、支偉成「國學用書類述」，列舉書籍三千二百種。
- 八、章炳麟「中學國文書目」，列舉書籍五十一種。
- 九、徐敬修「國學常識書目」，列舉書籍二百六十二種。
- 一〇、傅屯艮「中學適用之文學研究法」，列舉書籍七十九種。
- 一一、沈信卿「國文自修書輯要」，列舉書籍五十種。
- 一二、湯濟滄「中小學國學書目」，列舉書籍一百零六種。
- 一三、吳虞「中國文學選讀書目」，列舉書籍一百四十二種。

但是，看了這些列舉的書目，我仍舊不得不感到：它們沒有太多的用處，它們的毛病在不該有的有了，該有的卻又沒有。它們無法把古書予以現代分類、無法從現代分類裏透視古書的推陳出新的意義。同時，它們只提出書目，沒有書本，雖然告訴人可以按圖索驥，但是驥在那兒，也要大費周章啊！

新的版本觀念

由於時代的轉變、由於「知識的爆炸」、由於傳播知識的方法等等，都有了不同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，從事這一努力的時候，就要採取現代的觀點，來處理古書。以版本（板本）

爲例，現代印刷術的進步，尤其是影印技術的進步，使刊布圖書的方法，根本改變，同時也改變了「珍本」、「秘本」、「孤本」等古董觀念，使古書不復成爲某一階層人的獨得之秘。當然，對古書，非不可講究版本，但爲一二校勘之便或幾個異文訛漏，就把一部書的功能和流傳性絞殺，則顯然是舊式藏書樓主的行爲；同樣的，爲了講究版本之說，整天光刊些無甚價值的僻書，或一刊再刊些「版本競賽」的常見經史之類，也不能不說是舊式版本學家的流毒，對鑑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業，爲功究屬狹窄。

當年黃堯圃的學生，曾有過書無庸講本子的議論；俞樾的學生（章炳麟）也提過讀書何必講究版本的疑問。這些見解，都是從「取其大者」的角度，來從古書選材的，他們並不斤斤於「與薪之不見」的癖好，當然也反對先以偏爲務、再以偏蓋全的專家孔見。

現代處理古書的標準，不該以古董式的版本爲尙，也不該以鑑賞、校勘的用途爲足，而該以配合新知的研究，定其去取。例如商務印書館的宋本「資治通鑑」，當然沒有胡三省的音注，在鑑賞和校勘上，雖然有它的價值，可是在普及和實用上，就遠不如它的重排本「資治通鑑」；商務印書館的「四部叢刊」本無疏單注「五經」，在普及和實用上，也遠不及藝文印書館的阮刻「十三經注疏」；同樣的，「仁壽本二十五史」中的南宋印北宋監本「史記」，在普及和實用上，也遠不如黃善夫本或殿本或瀧川會注本，這些例子，都說明了版本的考究，並不就是弘揚了古書^①。

出土帶來了新收穫

除了現有的古書以外，從汲冢到敦煌，歷代也偶有古書的出土，值得我們特別重視。近

十年來，古書的出土，更達到「漢唐以來所未有也」的地步，新出土的古書，帶給我們前所未有的新發現，使我們在處理古書上，有了古人所沒有的收穫。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，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號、二號漢墓裏，發現了一批竹簡，由於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（紀元前一三四年）的曆譜，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；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，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，都早於漢朝。再往上推，秦二世在位三年，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，上距戰國，不過四十多年，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，沒有人有開工夫造假書，所以竹簡中的古書，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，應無疑義。

例如這批竹簡中，有古書「尉繚子」。「尉繚子」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，是偽書，並且說得頭頭是道。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，證明了真金不怕衆口鑠金，大牌學者也者，不過大言欺人而已。

如今「尉繚子」出土了，我們當然要恢復它在古書中的應有地位。

帛書也出現了

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，在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二、三號漢墓，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，最難得的是，其中有十二萬字以上的帛書（因為那時紙還沒發明，只能寫在帛上，故叫帛書）。帛書中有一部分是失傳了的古代醫書。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種病名，和治療它們的二百八十個醫方（每個都沒有方名）。每個病的醫方，從一個到二十七個不等，專家們把這部書，定名為「五十二病方」。

「五十二病方」是中國最古的醫學文獻，它顯示出來的病名，在內科方面，有肌肉痙

攣、精神異常、往來寒熱、小便不利、小便異常、陰囊腫大、腸道寄生蟲、和中蠱毒；在外科方面，有外傷、化膿、體表潰瘍、動物咬螫、肛門、皮膚、腫瘤；在婦科方面，有產時子癇；在兒科方面，有小兒驚風；在五官科方面，有眼疾。用現代的觀點來看這些醫學材料，看這些早於「內經」等現有醫書的材料，它們值得研究的意義，自然非比尋常。

又如同時出土的「相馬經」，這是中國動物學、畜牧學的重要文獻。

春秋戰國時代，由於已從車戰演變到騎兵，馬的身價，也就越來越高。傳說中的相馬專家是伯樂，事實上，這種專家是很多的，「呂氏春秋」（觀表篇）就提到十個相馬家；「史記」（日者列傳）也提到「以相馬立名天下」的人氏，這些都可證明古人對相馬的重視。這部「相馬經」竟用來給死人陪葬，它在當時，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。讀了這部書，我們不得不驚訝：古人對馬，原來是這樣不馬虎！

搜尋亡佚

另一個現代的觀點是被埋沒的古書的廣為流傳。中國歷代的戰亂不斷，圖書上的損失，早已無法細計，不論無意的被焚於兵禍，還是有意的聚燬於七塔，對文化而言，自屬有害無益。今天我們得現代印刷術之便，實在應該把這些被埋沒了的古書，儘量予以亮相，以免及身而絕^②。過去有心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，就是出版「叢書」。

「叢書」在中國歷史上，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孫、俞經的「儒學警悟」，這部書成於宋寧宗嘉泰元年（一二〇一），距離今天，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。

七百八十多年來，從事文化出版的人，輯印叢書的種類很多，但是專輯近著搜尋亡佚

的，除了光緒年間潘祖蔭的「功順堂叢書」、趙之謙的「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」外，實不多見。尤其趙之謙的叢書中，收有七絃河上釣叟的「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末」一卷，更可以看出輯刊者的歷史眼光。

宋朝以來，因為受印刷技術的限制，不能影印，至多只能影刻，直到清末，還是如此。陳三立的「黃山谷集」、端方的「東坡七集」，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。但因影刻太貴，且產生竄易首尾節略翻刻的缺點，給了人們不良的印象。現在印刷術進步了，並且超過了商務印書館「四部叢刊」、「古逸叢書」、「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」的影印水準，所以現在為被埋沒了的古書，做亮相的工作、做搜尋亡佚的工作，自然也就責無旁貸了。

現代分類

由於過去的通病是儒家掛帥下的四部分類，古書所遭遇的摧殘，是相當嚴重的，這種掛帥和分類不打破，中國的古書情況必將永遠陷在不均衡的畸型裏，陷在比例不對的懸殊裏。

所以，用現代的觀點處理古書，必須首先把儒家掛帥四部分類的錯誤予以矯正，把所有古書，重新估定，該拉平的拉平，該扶起的扶起，該縮小的縮小，該放大的放大，該恢復的補足，該重視的給它地位^③。這樣重新估定之下，整個中國文化遺產，才能均衡的、成比例的重新呈現在我們眼前。我們再用現代方法去「新瓶裝舊酒」，古書才不止是古書，才有現代的意義^④。在現代意義的光照下：許多古書，古人所貴者，如今看來已是斷爛朝報；又許多古書，古人所賤者，如今看來卻餘味無窮。如今我們處理古書，並不是止於把它們進一步分類（如劉國鈞「中國圖書分類法」或杜定友「杜氏圖書分類法」），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陣就算

完事，而該大力發掘並認定真正值得現代學術「癩祭」的典籍，否則的話，只是引今泥古而已，離玩物喪志，也就不很遠了，「學術」云乎哉！

解決難讀的問題

除了現代分類外，如何解決讀得懂古書的問題^⑤，也是現代的觀點中不能忽視的事。中國古今語文上的變化，差距很大，「尚書」中的文告，在當時是口語，現在是很難的文言了；「論語」中的對話，在當時是口語，現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。所以古書的文字語言，對現代的中國人說來，有時比外國文還恐怖。這一現象，早在半個世紀前就被提出來討論了。梁啟超在一九二五年寫「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自序」，就指出：

諸君對於中國舊書，不可因「無用」或「難讀」這兩個觀念，便廢止不讀。有用無用的標準本來很難確定，何以見得橫文書都有用，線裝書都無用？依我看，著述有帶時代性的，有不帶時代性的。不帶時代性的書，無論何時都有用。舊書裏頭屬於此類者確不少。至於難讀易讀的問題呢，不錯，未經整理之書，確是難讀，讀起來沒有興味或不得要領，像是枉費我們的時光。但是，從別方面看，讀這類書，要自己用刻苦工夫，披荆斬棘，尋出一條路來，因此可以磨練自己的讀書能力，比專吃現成飯的得益較多。所以我希望好學的青年們最好找一兩部自己認為難讀的書，偏要拼命一讀，而且應用最新的方法去讀他，讀通之後，所得益處，在本書以內的不算，在本書以外的還多着哩。

現在，半個世紀過去了，中國人讀古書的能力更不如前，時間也不如前了。所以，有心人處理古書給現代的中國人，必須兼顧到現代人的讀書能力，精挑細選之後，必要的解題、註

釋、翻譯，也該盡量齊備^⑥。

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

基於上面所說的一些有關古書的重點，基於上面所說的一些心得和認識，王榮文和我，經過多次的交換意見和反覆討論，決定在「中國歷史演義全集」成功後第四年的今天，推出一部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^⑦。

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的構想，部分接近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鶚（Charles W. Eliot）的「哈佛叢書」（The Harvard Classics）。「哈佛叢書」長五英尺，又名「五呎叢書」（Five Foot Shelf of Books），是用五英尺長度的精裝書，把西方古典名著，收入精華。由於中國古書太多，在性質上也與西方互異，這部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，在編選方面，自然獨有它的特色。我們決定按照現代圖書分類，精選出兩百種古書^⑧，每種「加工」以後，也以五英尺的長度^⑨，精裝起來^⑩，配上圖片^⑪，貢獻給現代的讀者。我們用這部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，把中國古書，做一次澈底的、劃時代的處理，用現代的觀點、現代的印刷術、現代的出版企劃，把它們帶到現代的中國人面前。

我們希望，這部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的問世，可以使現代的中國人，能夠多少知道做為中國人應有的條件是什麼，多少知道祖宗們的遺產是什麼，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可以入寶山而不空手，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對我們並非高不可攀。

我們相信，這部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的問世，可以把現代人看古書的問題，得到滿意的一次解決。有了這部大書，你可以上下古今，把千年精華，盡收眼底；你可以縱橫左右，

把多樣遺產，羅列手邊。你可以從古典中尋新義；從舊籍裏找時潮；從深入淺出的文字裏，了解古代的中國和現代的中國。

做爲一個「舊學邃密」「新知深沉」的中國人，我想逢今之世、處此之島，沒有人比我更適合做這一件大事了；也沒有人比王榮文更適合推動這一出版計劃了。我們高興在我們的努力下，終於完成了這部大書，相信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，會和我們一樣高興。

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，李敖在臺灣。

① 這套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特色，我舉一個例。我收進了顧炎武的「亭林先生遺書彙輯」，在這個全集性總名下，我選的是「日知錄」，但我用的「日知錄」版本，却是一九三二年張繼搜集得到的「何義門批校精抄本」，其中有「胡服」等文字，這是一般「日知錄」所沒有的。所以這套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所用的版本，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。這類特色，是很不容易的。爲了達到這些好效果，有的版本，我甚至商請所有者特別同意我使用，桂冠圖書公司的「中國古典文學名著」中的幾種書，就是賴阿勝特別同意的。我要謝謝他。

② 這套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，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絕世稿本「秋審小看」，這是它第一次與世人見面。

③ 這套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，儘量表揚被壓扁的異類思想，特別注重中國古書中的多樣性、獨創性、與個性。因此，作者羣中，入獄的、殺頭的比例也頗大，這是一個必要的義舉。——點燃舊日的火種，加添今後的光明，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個心願。至於純屬個人的一些感情氾濫的集部書，我有意縮小它們的比例。

④ 把難以分類的古書，納入現代分類，是這套「中國名著精華全集」的一大特色。爲了使中國人對中